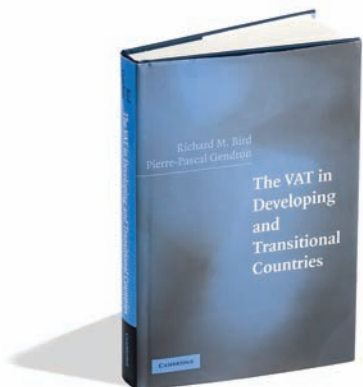


最低的税收选择



Richard M. Bird和Pierre-Pascal Gendron

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增值税

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坎布里奇和美国纽约，2007年，278页，70美元（精装）

由Richard M. Bird和Pierre-Pascal Gendron撰写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增值税》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本书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有关采用和实行增值税的重大问题的综合论述全面而具有创见。

对于进行这样的分析来说，本书作者占据了尤其有利的地位。Bird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也是公认的增值税专家。他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就职，并独自在50多个国家工作过。Gendron也是一位公共财政经济学家，曾就职于加拿大政府，并广泛参与了财政与税收事务的咨询工作。

本书给人的感觉是，现行增值税多种多样、较为复杂，而且围绕这一税种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但是作者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增值税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财政

工具。在本书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是否应该全部开征增值税？并肯定地回答“是”。

尽管本书余下的部分没有突破许多新的基本理论，但它还是支持了这些论点，并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实施增值税的一种微妙观点提供了支持。本书指出，关于不同增值税在设计上的特征，尤其它们运作结果之间的关系，目前普遍缺乏实证分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书的主要结论论证了一个与税收政策和管理思路相对立的新鲜而有见识的、可行的观点，无疑反映出作者在过去许多年里在世界至少25%的国家广泛工作的阅历。

更好的选择

在对全球增值税增长的一片赞扬声中，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政府税收确实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增加，这一点很重要，但有时被忽略了；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开征增值税也许是最不完美的办法。作者注意到，面对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税收收入有可能由公司所得税来承担，而全球的个人收入税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税收设计中，重大的选择是在薪金税和增值税之间做出的。按照作者的观点，与薪金税相比，增值税更适合用来调节非正规经济。

本着对增值税的信任，作者继续讨论了两个主题，它们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对税收进行适当设计时涉及的基本问题。首先，像生活中一样，在税收设计中，只求还好不求最佳是错误的——面对空前增长的法律、政策与管理上的复杂性而试图解决所有增值税问题是

注定要失败的。其次——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作者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试图涉及其他国家以前没有成功涉足的领域。

作者认为，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的国家最好是关注于基本权利，把实行最前沿方案的事情——例如遏止欧洲类型的竞技比武的失误、解决数字化销售中的问题以及税收财务服务——留给在财力和管理能力上更有承受力的国家来办。正如他们正确指出的，在发展中国家，“税收实际上是……受行政能力支配的，而且政治上是必要的。”

说到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的具体设计特征，作者总体上坚持传统的意见（他们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又不同于20年前的传统意见）。这包括诸如对增值税的登记采取高门槛限制了纳税人数量，尽可能弱化减税，避免多重税率，使用适当的审计方法取代高科技的计算机系统以及避免免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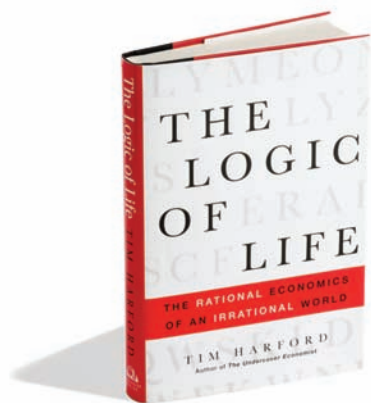
第八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论述了人们对省州级增值税日益高涨的兴趣并越来越多地使用。作者就当前这方面的实践状况和理论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概述和分析。本章的结尾以现实主义为特色，并恰到好处地细心注意到“（省州级增值税）是否能在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令人满意地运作尚有待观察，在这类国家，邦政府具有某种较大的财政权限，然而，中央政府与邦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行政能力限制。”

《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增值税》定会给任何一位对税收设计、公共行政管理或一般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的书架增添价值。

Victoria Perry
IMF财政事务部部长

书评编辑Archana Kumar。

理性解释“天性”



Tim Harford

生活的逻辑

非理性世界的理性经济学

兰登书屋，纽约，2008年，272页，25美元（精装）

亲爱的经济学家：

我感到自己被当前四处泛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书籍淹没了。在读了Tim Harford的前一部著作《秘密的经济学家》以及《透露观点》、《无视事实》、《群体的智慧》，以及当然还有《怪异经济学》之后，我到底应该听劝读一下《生活的逻辑：非理性世界的理性经济学》，还是应该坚持读我的经济学教科书？您是否能够告诉我这么多的此类书籍是如何写出来的？

流行经济学中的迷失者
亲爱的流行经济学中的迷失者：

是的，《生活的逻辑》非常值得一读。

首先，其他书籍可能会选择诸如结婚与离婚、肥胖症、赌博、嗜好或者您的老板等等漫无边际的事作为假设——是的，所有这些事情确实关乎人的一生？而且目前其他经济学研究除了这些问题外，还对诸如城市人口变化动态、工业革命的起源以及为何我们的智人祖先可能使尼安德特人灭亡等等之类的问题提供了令人亢奋的解释。

其次，在别的地方您可能看

到对CEO们为什么能拿这么高的工资的理性解释（暗示：并不是因为“他们值这么多钱”），或者为什么《性别与城市》的Carrie Bradshaw会悲叹曼哈顿的男人太少，而且也不移居到比如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Harford解释道，“妇女数量众多可能决定了她们与其去竞争奇货可居的男性，不如移居到男人虽穷，但人数更多的地方去。”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在政治上过于荒谬，那么，试想一下，根据生物进化论，有权势的男人就能更好地保护家庭，而更年轻的妇女就能生育更多的子女。

第三，在别的地方您可能被介绍给一个比如著名的角色定型的杰出人物，他坚信自己确实能比虚构的更强大，从电脑怪人“耶稣”克里斯·弗古森变成扑克冠军，他在2000年和2004年世界扑克系列赛中的赢局比十年中任何一个使用John von Neumann的扑克模型的手都要多（注：在拉斯维加斯可别用这一手）。您也可能被介绍给头顶诺贝尔桂冠的托马斯·谢林，他用博弈论将世界从核战争以及禁烟中拯救出来（任何一个吸烟者可能都会告诉您后者比前者更难）。

于是，在《秘密的经济学家》之后，Tim Harford再次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前沿性研究中的游历，即从一个“经济学家培育的新品种”，到坚信一个简单的承诺：我们在对激励做出回应。Gary Becker和谢林明显受到Harford的影响，他们俩将理性选择的视角应用于大多数不可能使用的生活领域。加上一大群现有的新思想者（Daron Acemoglu、Ed Glaeser、Lena Edlund、Michael Kremer、Mark Granovetter、Justin Wolfers等），您会得到一个令人眩晕的、有关奇闻佚事的集子，它们由一个关键假说粘在一起：有关生活的许多问题、浪漫故事、加法、城市化，甚至种族隔离都能被说成

是人类理性的曙光。

但是，您可能会问，理性是所有事物的动因吗？非理性的行为不也是构成人类天性的主要成分吗？正如Dan Ariely从最近的行为经济学中总结出的一部著作《墨守成规的非理性：促成我们决策的隐藏因素》中指出的，我们不可能对我们所面临的不同抉择的价值都进行理性的计算。例如，关于老实在公共小吃店中行窃、官方供应但是没有钱以及病人使用昂贵的药品比用廉价的普通药品的结果更好等等问题的思考。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激励经济学”——亦称Harford市场诀窍最佳模型——与“情感经济学”对立起来，在情感经济学中，经济行为有可能会因对诸如情感、冲动与社会道德等因素的错误理解而受影响？

这正是《生活的逻辑》所要纠正的地方。我们可能正处在从理性选择出发的好时机，但是，对标准的人类理性假说的解释依然惊人地多。一旦您去探究工作中所隐藏的激励因素，并想搞清如何加以应对的时候，那些看上去不能说明的东西乍一看会形成您的感觉。纽约人和伦敦人花费更多的钱在城市生活，这种消费方式超过了他们工资的涨幅，这也是实情，就拿迪斯尼的股东来说，如果即便他的时间只花在看《猫和老鼠》上，他也会觉得在迈克尔·艾斯纳任期的13年中向他支付8亿美元的薪水是理性的。

至于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最好的卖方都在用经济学这把透镜来解释一切事物，这是对的。这证实了——如果必须证实的话——成功带来了仿效者，而经济学家是对激励做出最初回应的人。幸运的是，重拾《生活的逻辑》的应该是一个无头脑的人。如果您对人类的天性如何恰当地与“沉闷的科学”放在一起感兴趣，此举便是理性之举。

Gilles Bauche

IMF对外关系部顾问